

一 西方来客

1. “他们把我们当作新国民”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2月22日，星期日。繁忙、喧闹的纽约港，帆樯林立，船进船出。这里有一艘不起眼的不大的机帆船正要扬帆远航。它将开辟一条新的航线，驶向一个陌生的国家。这艘帆船就是即将首航中国的“中国皇后”号。水手们大概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这只小小的机帆船将打通分属于太平洋两岸的“最古老的与最年轻的”两个国家的航线，他们这次航行将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肇始。

“中国皇后”号由战时私掠船改造而成，载重360吨。它是当时海上普遍使用的机器发动的木帆船，由费城巨商莫里斯出面组织并联合纽约的一些商人共同投资购置。船长格林是

独立战争时期的海军上尉，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商务代理人山茂召也是独立战争参加者，且曾立功受奖，官至炮兵少校，精明能干，熟悉会计业务。船上还有水手等共 43 人。船上所载均系美国土货，其中有：人参 473 担，皮货 2600 件，棉花 361 担，铅 476 担，胡椒 26 担，羽纱 1270 匹。

“中国皇后”号横越大西洋绕道好望角，经印度洋，历时 6 个月，行程 20900 公里，于 8 月 28 日驶抵广州。中国人第一次直接同美国人打交道，自然感到新奇。美国人初来中国，也都谦恭有礼。山茂召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对我们非常宽厚，最初他们不能分辨我们与英国人之间的区别，把我们当作新国民。当我们将美国地图向他们展示，并说明我们疆域扩张和人口增长的情况时，他们对我国拥有如此大的，可供他们帝国销售的市场，感到十分高兴。他还绘声绘色地记下了一段他与中国人的对话：

“你不是英国人吧？”

“不是。”

“但是你讲英文，所以当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说不出有什么分别；但是现在我明白了。在我向英国人讲价钱的时候，他说：‘这

么多，——买吧，算了吧。’我告诉他：‘不，朋友，我给你这么多。’他看着我：‘滚开，瘪三，怎么！你到这里来——给我的货订价钱吗？’的确，大班先生，我看得很清楚，你不会是英国人，所以中国人都很喜欢你们的国家。”

“至此为止”，山茂召写道，“我敢说，这个人的评语是使我满意的。可是为公道计，我还不得不加上他的结语：‘人们初来中国，都是非常好的君子，都像你一样。我想你多来广州两三趟，你也变得跟英国人一模一样了。’”

这段对话至今读来仍令人深思。

“中国皇后”号上的货物通过中国行商全部售出；同时，又通过中国行商办齐了回程的货物：红茶 2460 担，绿茶 562 担，棉布 864 匹，瓷器 962 担，丝织品 490 匹，肉桂 21 担。船上人员还各自购置了一定数量的中国货，准备回国馈赠亲友或转卖。该船于 12 月 28 日离广州，沿原航线返回，1785 年 5 月 11 日返抵纽约。首航的全部投资是 12 万美元，净赚 30727 美元，利润率达 25%。

“中国皇后”号的首航成功在美国引起轰动。纽约报纸为此发表了长篇报道，其他商业城市的报纸也纷纷转载，纽约街头贴出了推销

中国货的大型广告，中国商品受到热烈欢迎。有一家报纸甚至要纽约全城的“教堂敲起钟来，一起向上帝感恩”。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还从山茂召那里购买了一批中国瓷器。山茂召向外交部长约翰·杰依呈交了关于首次驶华的详细报告，报告被转交国会，并大受褒扬。山茂召也名声大振，于 1786 年被任命为首任驻广州领事，这是美国第一个驻华领事。“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燃起了新英格兰商人开拓东方市场、追逐利润的强烈愿望，以致使美国商人不惜冒可能患上疾病或腹绞痛而暴死的危险，也要去进行远涉重洋的冒险。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对华贸易热：“在美国每一条小河上的每一个小村落，连只可乘 5 人的帆船都在准备出发到中国去装茶。”

2. 白银流向中国

早期中美两国，只有商务往来，没有政治关系。从 1786 年以后的 50 年中，美国政府正式委派领事常驻广州总共不过 14 年，这些领事仅仅是商人或商人的代表，他们的职责限于解决商业上的一些问题及船上人员的事务，连向船主和船上管理员索取贸易报告的权力也没

有。对于领事本人，这些职位只是一种荣誉，他们既不从美国政府得到薪金或津贴，也很少向美国政府汇报情况。中国政府也仅仅把他们看作商人的代表，与他们进行贸易上的联系，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关系。同样显然的是，早期的中美贸易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这些贸易是民间自发进行的，而非政府着意组织的。

早期中美贸易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美国有求于中国。

早在美国独立前，北美地区和中国就有了贸易关系，中国的茶叶已经享有盛誉，是当地人民的主要饮料之一，中国制作精美的瓷器兼有实用和欣赏价值，受到普遍欢迎，且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但当时北美大陆贸易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北美 13 州的商人不能直接进行对华贸易。独立战争后，北美 13 州赢得了自由，但新生的合众国面积仅 32 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200 万。由于英国的残酷掠夺，美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都遇到严重困难，国库空虚，财政竭蹶。英国仍然把美国当作敌国，对美国货课以高额关税，不许其船只驶入加拿大与英属西印度洋群岛；法国、西班牙等也对美国实行贸易歧视；北美 13 州国内市场狭小，所有这些情况迫使美国商人开辟新的海

外市场。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这样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自然使他们趋之若鹜。

而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对外国的“体恤之恩”。这种说法自然表现了清政府统治观念的落后、狭隘，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情况。中国本身是一个比欧洲地域更广、人口更稠密的贸易区，且中国经济自给自足，不需要什么美国货。就当时的实际经济水平来说，中国比美国富庶。

第二，中美贸易发展迅速。

尽管清政府对外商在华贸易和行动加以种种限制，外贸限在广州一处口岸，由专营对欧美贸易的行商（即所谓公行，通称十三行）组织起来办理，行商担保外商缴纳税饷，负责约束外商在广州的居住和行动，等等，所有这些限制都不能削减美商发展对华贸易的热情。从 1791 年到 1841 年的 50 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 6 倍多。1792 年后，中美贸易额仅次于中英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居第二位。

19 世纪上半期，美国对华贸易仅次于美国对英、法、古巴的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居第四位。从乾隆五十年（1785）到道光十八年

(1838) 的 54 年间，来华外国商船共 4519 艘，其中 1/4 (1150 艘) 为美国船。以 1784 年与 1833 年作比较，美国输华货物从 27290 银两增至 1766692 两，从欧美各国输华总值约 1.4% 增至 19.3%；同时期中国输美货物从 15864 银两增至 3321266 两，从中国对欧美各国输出总值的 0.3% 增至 24.7%。虽然中美之间贸易额仍远逊于中英贸易，但已超过中国对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

中美贸易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以及美国政府采取的保护对华贸易的政策。比如，1791 年国会通过保护对华贸易的关税政策，外国船只运进的中国货每吨征税 0.46 美元，而美国船载运中国货进口每吨仅征税 0.125 美元，仅为外国商船的 1/4，同时又允许茶叶税延期两年缴纳；1832 年美国对直接从东亚运来的茶叶第一次完全免税，对大部分中国货也减低税额，这个办法一直实行到 1842 年。

第三，中国大大出超。

在殖民地时期，英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压抑和禁止北美工商业的发展，使殖民地完全成为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业销售市场。北美经济农业为主，工业非常微弱，且主

要是手工业。独立后，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农业国，没有什么工业品可供出口。因此在早期中美贸易中，中国一直享有顺差，美商主要用白银支付逆差，使中国得到相当多的硬通货。据统计，1805至1833年间美国输华货物总值为50294001美元，白银为89447817美元，为货物总值的 $1\frac{3}{4}$ 倍多。这些银元主要是墨西哥银元和西班牙银元，一部分是美国通过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获得的。

美国输华商品按其来源可分西方产品和东方产品两大类。所谓西方产品是美商运自本国、北美的土特产和从欧洲贩运来华的工业制品，其中以人参、皮毛和棉花为大宗；所谓东方产品是指美商在来华途中停泊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各港口时沿途收购的商品，如斐济的海参、巴达维亚的糖和咖啡、苏门答腊的胡椒、夏威夷的檀香木、孟买的棉花、菲律宾的大米以及土耳其和印度的鸦片。

中国输美的商品主要是茶叶、丝绸、土布和瓷器。

一直到鸦片战争前，茶叶在中国输美商品单上稳稳地坐着第一把交椅。1817至1845年，中国输美茶叶平均占输美商品总值的58%以上。18世纪的最后10年中，输美茶叶

平均每年 1.7 万担，而 1831 至 1840 年的 10 年间，上升到年均 11.36 万担，增长了 5 倍多。这些茶叶并非全部运回美国市场，相当一部分辗转销售于世界各地，或输入美国后又出口至其他国家。

丝绸和生丝在美商购货单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 1821 至 1831 年的 11 年间，有 10 个年份丝绸和生丝占全部输美商品的 1/3 以上。1832 年美商购买的中国丝绸为英商的 4 倍。19 世纪中期以后，由于美国丝绸工业的兴起，以及日本生丝的竞争，中国丝绸在美国市场的优势逐渐丧失。

中国土布价廉物美，在西方国家有广阔市场。19 世纪 20 年代以前美国纺织工业弱小，只能以棉花来换取质地坚牢的中国土布。1826 年以前，美国是中国土布的头号买主。此后，随着美国纺织工业的兴起，土布输美逐年减少，及至 40 年代，风水倒转，已不是中国土布输美，而是美国洋布输华了。

中国瓷器既是日常用品，又可用作高雅的装饰品，或馈赠亲友的礼品，受到北美人民的青睐。“中国皇后”号就带回了一批瓷器，其中有些是定做的，印有“皇后”号帆船图形和广州风光的瓷碗、瓷盘，现在仍被珍藏在各地

的博物馆中。有人估计，《望厦条约》以前运往美国的中国瓷器有数百万件。这些瓷器已经远远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而成为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一种载体。

第四，中美两国都从贸易中获利，但利润的社会效果不同。

早期的对华贸易养肥了一批美国资本家，有时他们赴华一趟竟可赚取百分之数百的利润。这些美国商人于是成为国内的投资巨头，或用来发展船舶制造业和其他与对华贸易直接有关的事业，或投资于本国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成为美国第一代产业资本家或铁路巨擘，或从事金融、房地产事业。美商阿斯特从 1800 年到 1809 年在广州的贸易中获利 50 万美元，其中大部投资于曼哈顿的房地产业；他还是中央铁路公司的大股东，死时留下 2000 万美元遗产。波士顿的珀金斯从对华贸易中所赚的钱远远超过阿斯特。他在中国大发其财后，投资于房地产和铁路，他还拥有一家铁矿公司和一座铅矿，并开设了纺织厂。珀金斯公司的代理人 1803 年到广州，后主持公司生意，1831 年带着近百万美元回国。后起的琼记洋行和旗昌洋行的行东也先后把从对华贸易中积聚起来的财富带回国内，成为新英格兰地区纺

织工业的开拓者和密歇根中央铁路公司的大股东。总之，从对华贸易中获取的商业利润转化成了工业资本，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带有买办倾向的特许商人和清朝官吏也从早期中美贸易中大获其利，银元滚滚不断地流入了他们的钱囊。不过，他们的利润却没有转化成资本。他们或者把金钱投向农村，购买土地进行封建剥削，或者长年累月存放家中，或者挥霍无度，不用于扩大再生产。这种利润基本上没有起到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

上面已经说到，中美贸易中中国享有很大顺差，美商不得不满载着银元到中国购货。但美国不是白银生产国，通过和其他国家贸易获得的白银，数目毕竟有限。19世纪初，美商找到了一种可以替代白银的商品——鸦片。鸦片毒害人们身心健康，清政府早在1729年就明令查禁，以后又一再重申不得进口。但清政府愈禁，走私鸦片的非法利润也就愈高。起先是葡萄牙、荷兰商人从事这一罪恶勾当，后来英商成为主要鸦片走私者。美商走私鸦片大约始自1805~1806年间。美商一般从地中海、土耳其购进鸦片到中国销售，或间接贩卖印度鸦片。因为是走私，人们无从得知其确切数

额。有的资料表明，1816～1833年间美商走私鸦片总额 6495901 美元，约为输华货物总值 42705871 美元的 13%。美商的鸦片走私活动是早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污点。

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是早期中美关系的主流。但是美国商人的鸦片走私，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扩张欲望与清朝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力图与世隔绝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深刻冲突，已经潜藏着改变这种平等互利关系的因素。

3. 传教士来到中国

随着商人来到中国的是传教士。1830年，美国海外传教会在美商赞助下派裨治文和雅禅理来中国，开美国传教士来华之先河。此后美国新教传教士接踵而来。据统计，1830至1847年间，各国派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共 98 人，其中美国 73 人。美国传教士来华并非完全是由于宗教的召唤。美国人自立国起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认为美国与众不同，美国不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国家，而是依据这样一些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这些原则应当成为全人类行为的共同规范，美国人的思想、价值观

念、民主制度是最优越的，有向全世界推广的责任。这种“天定命运”观，是与宗教信仰相联系的一种传教狂热。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既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义，也是为了传播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在对外关系中特别重视意识形态、文化宣传的作用，这是美国外交的特点之

由于清政府禁止基督教流传，这些传教士只好转弯抹角地通过各种途径扩大自己的影响。

他们在中国从事出版、译述、医务和教育等工作。由裨治文主编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1832~1851），又译作《中国汇报》，广泛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历史、风土人情等各方面情况，以及从清廷到地方各级官吏的情况，中外交涉、中外贸易的状况，译载清政府的上谕及大臣奏折，对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和促进中美贸易起了作用。当时广州的外商从这些刊物中获益匪浅，对中国认识还很肤浅的美国政府，也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日后《中美望厦条约》中的许多条款，就是根据《中国丛报》提供的情况和建议拟定的。

1834年12月，在华英美传教士及一部分

商人组成中国益智学会，编印通俗宗教宣传品，并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史地知识。裨治文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是第一本用中文撰写的全面介绍美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它成为中国朝野了解美国的主要依据。早年睁眼看世界的开明、先进的爱国者魏源在增订《海国图志》时，有关美国材料几乎 2/3 取自该书，梁廷枏的《合省国说》也以此书为主要资料来源。卫三畏 1833 年来华，在广州为美国公理会创办印刷所，还研习汉语、日语，先后出版了《简易汉语教程》（1842）、《中国地志》（1844）、《中国总论》（1848）等著作。在此之前美国学者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中国文化历史的著作，他的《中国总论》一度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必读书。

美国教士还在广州开设医院。1835 年 10 月，传教士彼得·伯驾开设了“眼科医局”，受到广州各界的赞扬，6 个星期之内就有 450 人到该医局就诊，行商伍敦元还给了不少资助。林则徐到广州后，也曾间接向伯驾求医问药。

美国教士还通过创办学校直接向青少年灌输基督教义。1836 年，寓居广州的外侨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由美商奥立芬赞助，裨治文任秘书。他们集资办学，并呼吁英美教育界派

遣教员来华。耶鲁大学几名教授作出热烈反应，于 1838 年 10 月派该校毕业生勃朗来华。1839 年勃朗夫妇在澳门开办了马礼逊学校，但在科举制度下，中国士大夫阶层把子弟送到外国人办的学校就读不啻是断送他们的前程，因此入学者寥寥无几。1841 年只有 6 个学生，其中之一是容闳。1842 年学校迁往香港，鸦片战争后，由于迫切需要通事（翻译）人材，入学人数才有所增加，1845 年达 30 人。学校课程除汉语外，还有基督教教义、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音乐等，这是在中国传播西学的第一所洋学堂，它给予学生的知识自然比中国封建的学塾丰富。勃朗夫妇于 1847 年返美，容闳等三名学生随他们前往美国。这是第一批中国留美学生，容闳等在勃朗及美国友人帮助下，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容闳后来考上耶鲁大学，成为该校第一名中国学生。勃朗是第一个向中国学生系统传播西学，促成中国学生留美的外国人。

由于清政府禁止基督教流传，也由于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传教士虽然多方设法，但传教活动却收效甚微。到 1839 年领洗者不到 100 人，而且主要是给外商服役或

经营外贸的下层人十。

总之，早期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的新知识介绍到中国，他们的文化活动，成为先进的中国人了解西方的重要媒介，在客观上起了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

二 条约关系

1. 《望厦条约》的订立

自从英国在 1840 至 1842 年的鸦片战争中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便进入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条约体系”的时期，即：资本主义大国通过武力威胁、侵略战争或其他手段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使中国社会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时期。

《南京条约》的签订拆除了列强入侵中国的藩篱，美国政府紧接着采取了行动。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情况的马萨诸塞州众议员顾盛于 1842 年 12 月 27 日写信给泰勒总统，建议遣使赴华，与中国订立与《南京条约》相类似的条约。泰勒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委任顾盛为赴华特命全权大使。1843 年 5 月 8 日，国